

胡全章〇著

晚清小说 与文学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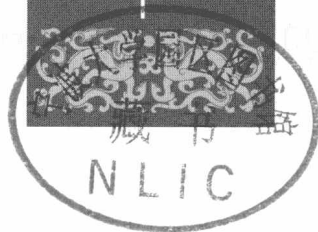


NLIC297081766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胡全章〇著

晚清小说 与文学转型



NLIC297081766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小说与文学转型 / 胡全章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161 - 0724 - 9

I. ①晚… II. ①胡…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清后期②中国文学—近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7.41②I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65947 号

晚清小说与文学转型 胡全章著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曦

责任校对 刘晓红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64073831(编辑) 64058741(宣传) 64070619(网站)
010-64030272(批发) 64046282(团购) 84029450(零售)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5.25

字数 251千字

定价 46.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2006年，在导师的指导下，胡全章出版了研究近代作家的著作《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探询——吴趼人小说研究》（以下简称《吴趼人小说研究》）。这是当时国内出版的第一部研究吴趼人的专著，也是作者面世的第一部著作。四年后，胡全章又推出了《晚清小说与文学转型》，研究范围有所扩大，研究的问题集中于世纪转折时期的重要年份、小说理论与类型、学人与学术史研究等方面，呈现出立体交叉的研究态势。这一研究格局的设计，自有其内在理路，显示了作者对近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考、新探索。

《晚清小说与文学转型》第一章的重要年份研究在学术上具有特别的意义。作者把1897—1904年视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年份”或“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关键年份”，自有其文化、文学的根据。这一时期，是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重要转折年代，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文学最激烈变动的年代。历史演进的由量变到质变，它的变动形态的丰富性，诸如传统文学思想的衰微，新文学思潮的萌动，一切都有声有色，波涛迭起。转折年代也是文学发展的矛盾性、复杂性、多重性展示最为充分的时刻。牵一发而动全身。转折点到来的某些预兆，往往能够或隐或显地看到若干蛛丝马迹；未来文学的发展趋势，常常会在这一时刻透出某些端倪。这些，都为研究者提供了巨大的研究空间和用武之地。胡全章意识到，转折时期的文学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学术富矿，一片看不到边际的学术莽原，一个充满着诱惑力的学术磁力场。重视转折年代文学的研究，显示了研究者

胸怀全局的学术视野。不过，孤立地把某年看做“关键性年份”或“不可忽视的年份”进行分析，则不免有些拘谨和机械。现代文化史研究家刘梦溪说：“诸种因素组成的合力向我们昭示，1898—1905年前后这段时间，应该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端时期”，“至于发端的具体时间，似不好绝然化”^①。刘梦溪的提醒值得我们参考。

不言而喻，晚清民初文学成绩最大的门类莫如小说。那是一个小说理论批评异常活跃、新小说类型异常丰富的时代。该著第二章对《新小说》杂志开辟的重要理论批评栏目“小说丛话”的个性化把握与历史解读，对被长期尘封的小说批评家邱炜菱的小说理论批评的时代与历史意义的别有会心的阐释，对晚清翻新小说、乌托邦小说、言情小说等不同小说类型的历史描述与文本解读，都进入到了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晚清小说创作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家，当是被誉为“小说界巨子”的吴趼人。该著第三章关于吴趼人小说的研究和专著《吴趼人小说研究》虽然互有呼应，研究内涵却有所侧重。专著《吴趼人小说研究》的重点在解读吴趼人小说的主题意蕴，而《晚清小说与文学转型》中的吴趼人小说研究的着力点则放到了叙事特征、文体意识及对短篇小说的开拓性贡献的历史考察上。作者对吴趼人在小说限制叙事艺术探索及纯洁小说文体等方面的历史性贡献的辨析，对吴趼人短篇小说之文学史意义的探研，均眼光独到，论从史出，颇见功力。

第四章的中国近代文学学人研究，我所看重的，是作者对学人所作贡献的较准确把握，如胡适所构建的“古文—白话”消长起伏的研究框架，陈子展所具有的独立不倚的学术品格和无征不信的严谨学风，卢冀野对近代戏曲演变过程及其成败得失的梳理与评析，钱基博见解卓特、别具一格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杨世骥一以贯之的文学史眼光和学术史意识，以及任访秋出入于古典与现代之间，在研读大

^① 参见《中国现代学术要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12、114页。

量原始文献材料基础上对新文学渊源和近代文学转型期富有原创性的学术见解，等等，这当然是该著第四章的亮点；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也隐约感受到：从学人研究中胡全章所可能直接获取的成熟的学术研究经验。对胡全章来说，这既是学人研究，也是一次反观自我的学术清理。他意识到：这些近代文学研究者，他们具有清醒的学术冷眼，能够在自己开辟的学术领地里自由出入，得心应手。他们心地率真明亮，有智者的洞察与宁静。他们善于倾听研究对象发出的遥远的天籁之声，做到与研究对象心灵契合。正是这些研究者成功的学术实践，让胡全章感动、震撼，跃跃欲试，决心为近代文学这块尚待进一步开拓的温润学术沃土献身。同样，我在他评论关爱和《中国近代文学论集》时如下一段话中也读出了有意味的信息：“生长于激烈动荡时代，充当着古典与现代之间的桥梁与纽带的中国近代文学……应该写出几本堪称经典的学术著作，证明这个学科不仅是一种学界不可藐视的存在，而且值得我们后人永久研究下去”（《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这些话，完全可以看做胡全章的自我策励。近代文学学人研究，让胡全章既获取了宝贵的学术经验，又梳理了自己的思路，找到了迈向新的学术高地的门径，可谓一举两得。一个人内在的激情往往直通悟性。我为他的机敏灵动所获得的感悟而感到惊喜。

当然，惊喜之余我也有些微的忐忑不安。就本书而论，学术视野仍略显狭窄。晚清民初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生长点，但一个成熟的近代文学研究家，目光应该更为宏远，像他的导师所实践、所要求的那样，把眼光上溯至嘉道之际，那里才是伟岸壮阔的近代文学澎湃的源头；同样，研究还应下移至五四之后的二三十年，在那里，仍然能够感受到近代文学的余波与踪影。研究大视野的背后，有常人不易发现的新风光。假以时日，循此而进，胡君的近代文学研究就有可能产生某种带有颠覆性的新成果。为师为友，我们有理由对他提出这一新的学术期待。

刘增杰

2011年3月12日

目 次

序	刘增杰 (1)
第一章 文学转型：1897—1904	(1)
第一节 1897：涌动的前夜	(1)
第二节 1898：喧嚣与躁动	(10)
第三节 1899：革命与流行	(18)
第四节 1902：文学界革命起狂飙	(27)
第五节 1903：一枝独秀与众声喧哗	(37)
第六节 1904：白话·报刊·文学史	(50)
第二章 晚清小说：理论与类型	(62)
第一节 《小说丛话》：新小说理论的发展与纠偏	(62)
第二节 邱炜菱：被尘封的晚清小说批评家	(70)
第三节 翻新小说：类型与文体特征	(77)
第四节 乌托邦小说：主题与类型特征	(85)
第五节 写情小说：主题模式与叙事特征	(93)
第三章 吴趼人：叙事与文体	(102)
第一节 吴趼人与“小说界革命”	(102)
第二节 限制叙事意识的自觉	(110)
第三节 叙述自限与干预的失衡	(120)

第四节	吴趼人小说的文体意识	(127)
第五节	短篇小说：文体与新质	(136)
第四章	学术史：从胡适到任访秋	(144)
第一节	胡适：开山与成见	(144)
第二节	陈子展：开创与纠偏	(158)
第三节	钱基博：文学史的另一种写法	(166)
第四节	卢冀野：被遗忘的文学史家	(177)
第五节	杨世骥：史家眼光与学术品格	(188)
第六节	任访秋：奠基与探源	(204)
附录	古典与现代之间的探询	
——	关爱和先生《中国近代文学论集》读后	(220)
主要参考文献		(229)
后记		(233)

第一章 文学转型:1897—1904

近代文学八十年是中国文学由古典走向现代的艰难嬗变期，而19、20世纪之交的晚清时期则是中国文学转型的关键时期。世纪之交，古代文学的一系列思想规范、形式规范、语言规范渐次遭到怀疑、挑战和突破。沿袭古范的文学竭力在传统规范的范围内自我调整以求延存，却终因恪守古范而走向式微终结。与此同时，各种新的文学因素却在加速萌育、成长和组合，最终在梁启超倡导的文学界革命旗帜下汇成一股浩荡的时代潮流，中国文学因之而作出重大调整。

在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有几个重要的年份不可忽视。它们见证了中国文学新旧嬗代的历史轨迹，构成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变革过程中一个个大小不一的转折点。这些历史的转折年代，既有着过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又有着作为标志的“点”的鲜明性。考察文学史上这些重要年份，对这些历史关节点进行梳理和辨识，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一考察计划，将从1897年做起。

第一节 1897:涌动的前夜

1897年是维新变法思想异常活跃的一年。这一年，康有为那部产生了“火山大喷火”、“大地震”^①效应的变法理论著作《孔子改制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考》由大同译书局初刻成书，在禁锢的晚清政界和思想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产生了强大的冲击波。这一年，梁启超主编的作为维新运动一面旗帜的《时务报》“风靡海内”，“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①中国近代第一次办报高潮由此掀起。这一年，严复译著《天演论》首刊于《国闻报》增刊《国闻汇编》，在知识界引起轰动。《天演论》所阐发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优胜劣汰进化原理，鼓起了国人“保种自强”、“合群进化”、“与强者争生存”的勇气，并在思想上武装了维新变法的志士仁人，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维新变法思潮蓬勃发展，引领了时代潮流。

思想界的喧嚣，引发了文学界的躁动，19世纪末的文学观念、文学创作与传播方式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新变。1897年的诗界、文界、小说界、翻译界、报界和出版界，都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1897年的诗界，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新学诗”尝试已进入尾声，而黄遵宪则于这一年在《酬曾重伯编修》一诗中首标“新派诗”，这似乎预示了“新诗”创作的发展方向。“新学诗”的尝试在丙申、丁酉年间（1896—1897），“提倡之者为夏穗卿”；其特点正如梁启超所总结的：“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捋扯新名词以自表异。”^②“新学诗”是用诗歌形式表现“新学”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夏、谭、梁研讨“新学”的另一种文本记录。这种迥异于古典诗歌的创作实践，成为诗体探索、新诗尝试的肇始。遗憾的是，由于使用了大量生疏甚至是生造的词语、典故，造成了诗意的晦涩难懂；加上过多使用“新语句”，破坏了“古风格”，使之“已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③而黄遵宪早年就有诗歌革新意识，显示出与旧派诗人志趣迥异的“别创诗界”之怀抱。其海外诗以表现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的努力，用诗的语言记录描述了近代以来走

① 任公：《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

② 饮冰子：《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29号，1903年4月11日。

③ 任公：《汗漫录》，《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10日。

出国门的中国士人的闻见感触和情感世界，开辟了古近体诗表现现实生活的新空间与新境界。1897年，他在《酬曾重伯编修》第二首云：“费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①这是黄遵宪正式打出“新派诗”旗帜。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记：“丙申、丁酉间，其《人境庐诗》稿本，留余家者两月余，余读之数过。”^②《人境庐诗》无疑给梁启超反思“新学诗”创作中存在的弊端、探寻诗歌革新的出路，树立了可资参照的典范。两年后梁启超发动“诗界革命”时，高度评价“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③，将黄遵宪的“新派诗”树为“诗界革命”的样板，其历史因缘，早在1897年就已埋下。

1897年的文界，风靡一时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政论文章引领着时代潮流，并以其词驳今古、理融中外、骈散兼采、自由畅达的时代特征，表现出散文文体解放的征兆，实乃“文界革命”之滥觞。

1897年，《时务报》进入全盛时期。它延揽了梁启超、黄遵宪、严复、谭嗣同、夏曾佑、容闳、章太炎等一批维新志士或同情者作为撰稿人，其中尤以主编梁启超的政论文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时务报》不仅以其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和示范效应掀起了中国近代第一次办报高潮，以其发表了《变法通议》等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政论文章为中国思想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以其创造“时务文体”的努力，开一代文风。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维新派重要报刊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每期都必不可少的报刊政论的写作上。为了使政论文章更易于为广大受众接受，更好地向社会宣传变法维新思想，迫切需要一种适合时代需要的新的表现形式，于是一种通俗自由新颖的报刊政论文体即“时务文体”应运而生。时务文体是从梁启超在《时务报》

① 黄遵宪：《酬曾重伯编修》，《黄遵宪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29页。

② 饮冰子：《饮冰室诗话》，《新民丛报》第4号，1902年3月24日。

③ 同上。

上发表洋洋洒洒数万言的《变法通议》开始的，并以梁启超为代表人物。这种文体运用了新学语和新学理，以议论时政为主要内容，形式自由，富于表现力，显示出开阔的气概和雄浑的力量，已然表现出对桐城古文和八股文的初步解放。梁启超 20 世纪初年风靡一时的所谓“新文体”，正是以“时务文体”为起步的，其后又经历了 1898 年之后《清议报》的发展期，至 1902 年《新民丛报》创办后进入“新民体”时期，梁启超独具“魔力”的“新文体”散文才臻于成熟。

1897 年 10 月，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国事抢攘，民情沸腾，康有为敏锐地意识到“外衅危迫，分割洵至”^①，草拟《上清帝第五书》，向清廷缕陈变法主张。这位“诡诞敢大言”、“能为深沉瑰伟之思”的晚清“思想革新者之前驱”，发为文章，“则糅经语、子史语，旁及外国佛语、耶教语，以至声光化电诸科学语，而冶以一炉，利以排偶；桐城义法，至有为乃残坏无余，恣纵不羁；厥为后来梁启超新民体之所由昉”。^② 康有为此期的政论文笔锋常带感情，文气纵横恣肆，词驳今古，理融中外，具有巨大的政治鼓动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形式上不为古文、骈文所拘，散行俚句相杂，大大解放了散文文体，实乃梁启超“新文体”之先导。

1897 年的小说界，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理论家，已经充分认识到小说这一艺术门类所具有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他们迫切希望借助小说这种有着广泛群众性的文学门类，使之成为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利器。在这一政治外力推动下，历来被视为“小道”的小说观念发生着重重大变革。

1897 年，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卷十四“小说门”中写了一段识语：“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

^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康有为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 页。

^②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 1935 年版，第 268 页。

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谕，当以小说谕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①小说简直成了启蒙国民的百科全书，这当然是出于维新派开通民智以改革政治的考虑。然而，抛弃正统文人偏见，愿意为下层人民撰述，这在创作观念上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1897年，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把“说部书”与“识字书”、“文法书”等并列，作为蒙学教材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并特别提出“说部书”改革问题。在梁氏看来，小说“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②这是梁启超小说革新思想的最早表述。戊戌前夕的梁启超已经赋予小说以重大的社会教育职责。

1897年的小说界，不能不提及严复、夏曾佑联名在《国闻报》上发表的那篇题为《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宏文。阿英称其为“阐明小说价值的第一篇文字”，并断言晚清时期“对小说的重要性，获得进一步理解”始于该文。^③这篇在近代小说批评史上颇受重视的小说专论，从内容和形式的不同角度，详尽剖析了“夫说部之兴，其人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的原因与现状，水到渠成地得出“而天下之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的结论，并以中国“不胜其说部之毒”和“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的正反例证来证明小说所具有的巨大社会作用。^④文章旨在借小说为新民救国运动而鼓噪，却在客观上有助于冲破传统小说观念的束缚，为小说在社会上争得一席之地。作为戊戌前维新派小说理论的代表性成果，该文对近代小说理论与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实为“小说界革命”之前奏。

1897年的翻译界，无疑要记下严复和《天演论》的名字。甲午败绩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严复大受刺激，遂奋起翻译赫胥黎

①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第三集，第522页。

②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第五》，《时务报》第8册，1896年10月。

③ 阿英：《晚清小说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页。

④ 《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国闻报》1897年10月16日至11月18日。

的名著《进化论与伦理学》，取名《天演论》。严复 1896 年间曾将初稿送给挚友吴汝纶、梁启超、汪康年、夏曾佑等维新志士审阅指正或借抄，书稿内容不胫而走。1897 年 5—10 月，严复对书稿进行了较大修改；年底至次年初，修订稿以《天演论悬疏》之名在《国闻汇编》第二、四、五、六册陆续刊载。严复诠释的进化论，蕴涵强烈的生存竞争思想，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相契合，因而很快风靡全国。《天演论》是中国近代生存竞争思想的重要源头，其所传播的进化论思想解构了中国传统的历史循环论，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化论作为一种历史观和方法论，对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裘廷梁“崇白话而废文言”^①口号的提出，梁启超作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的判断，得出“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的结论，^②莫不受到《天演论》的启迪。刘师培关于“元代以来，复盛兴词曲，此皆语言文字合一之渐也”的判断和“文言合一”的主张，以及所持的“然天演之例莫不由简趋繁，何独于文学而不然”的文学的历史的发展观^③，莫不得益于《天演论》。王国维把属于“一代之文学”的宋元戏曲与明清小说置于文学之巅，其文学发展观中同样渗透着进化论的影子。五四时期，作为胡适文学思想——同时也是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基本架构的“白话文学正宗观”和“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更是以进化论为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天演论》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持续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发挥着作用。

1897 年的文学翻译，不能不提及《时务报》所刊载的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作为一家政治性刊物，《时务报》登载翻译侦探小说的用意，除了向国人介绍西方的新奇事物，也有着增益国人的科学意识

① 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国官音白话报》第 19 期，1898 年 8 月 27 日。

② 饮冰：《小说丛话》，《新小说》第 7 号，1903 年 9 月。

③ 刘师培：《论文杂记》，《国粹学报》第 1 期，1905 年 2 月。

和法制观念等深层考虑。而客观上,《时务报》的贡献不仅在于使国人认识了一个神探,更重要的是引进并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小说类型,展示了泰西小说的叙事优长。1896年8月,《时务报》第一期登载了中国第一篇翻译侦探小说《英国包探案访喀迭医生奇案》;其后,又以连载的形式登载了四篇阿尔唔斯(今译福尔摩斯)的故事:《英包探勘盗密约案》(载第6—9册),《记伧者复仇事》(载第10—12册),《继父诬女破案》(载第24—26册),《阿尔唔斯缉案被戕》(载第27—31册);其中,后两篇刊载于1897年。如果我们留意一下发表时间相差半年的前两篇译作和后两篇译作对原著叙述人称、叙事视角、叙事结构的处理,便会发现译者在接受域外小说的叙事技巧方面有了显著进步。前两篇译作都改变了原著的第一人称叙事,变成了全知视角,倒装叙事也取消了;这表明了译者在面对泰西小说独特的第一人称限制叙事这种对中国读者来说相当陌生的叙事手法时的困惑以及为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而采取的翻译策略。后两篇的叙述人称则改成了第一人称“余”——即滑震(今译华生),并且保留了原文的倒装叙事结构,第一人称限制叙事也得到保留。从1896年10月跨到1897年4月,在前两篇和后两篇翻译侦探小说里,译者对他们独特的叙事方式和叙事结构经历了一个从改造到保留的过程,这表明中国翻译家逐渐认可了域外小说的叙事优长,同时也预示着中国作家对新的小说品种、小说观念以及叙事方式认可与接受的肇端。

1897年的报界与出版界,也有几件影响着近代文学流向与面貌的值得一提的事。如前文所述,《时务报》、《国闻报》等以政论为主的报纸的出版,固然是政界和思想界的盛事,也推动了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尤其是提高了小说的社会文化地位。而《游戏报》、《消闲报》等文艺小报的创刊,也是该年度发生的与晚清文学创作关系密切的事件。1897年6月,李伯元“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创为《游戏报》,为我国报界辟一别裁”^①。创办《游戏报》

^① 吴趼人:《李伯元》,《月月小说》第3号,1906年12月。

是李伯元走上报人之路迈出的关键性一步，并获得了巨大成功。据郑逸梅回忆：“《游戏报》有谐文，有笑话，有花史，足以倾靡社会。于是冠裳之辈，货殖者流，莫不以披阅一纸《游戏报》为无上时髦。南亭亭长李伯元名乃大噪。”^①这一年，吴趼人也在李伯元影响下扔掉了江南制造局的铁饭碗，走上了主持小报笔政生涯，他主持的第一份文艺小报是1897年11月创刊的《消闲报》。李伯元、吴趼人是晚清最为著名的由报人走上职业小说家道路的成功人士，办文艺小报不仅是他们从事新型文化产业的起点，也为其后从事小说创作打下了多方面的基础。《游戏报》、《消闲报》等文艺报在培育晚清小说作家、影响晚清文坛风气、孕育晚清文学市场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1897年的出版界，无疑要记载下商务印书馆的创办这一文化事件，它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开端。晚清以降，商务印书馆为弘扬中华文化、传播人类的智慧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仅就发行文学书刊而言，1903年创办《绣像小说》并开始出版“林译小说丛书”、“说部丛书”等小说丛书，1904年创办《东方杂志》，1909年创办《教育杂志》，1910年出版《小说月报》，1921年出版《小说世界》，均名噪一时。商务印书馆大力推出这些文学书刊，繁荣了文学市场，对晚清和五四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897年，“言文合一”的时代呼声已在知识界产生广泛影响。黄遵宪1887年就在定稿的《日本国志》中比照西洋语言文字，对中国语言文字提出了言文必须合一、行文必须“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要求；^②经1894年薛福成为之作序，1895年由广州富文斋初刻成书，1896年梁启超为之写后序，该著在新派知识分子圈里流布渐广。至1897年，严复、夏曾佑也认识到“故书传之界之大小，即以其与

^① 郑逸梅：《南亭亭长》，魏绍昌编：《李伯元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2页。

^② 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20页。

口说之语言相去之远近为比例”^①，倡导用言文合一的小说作为开启民智的工具。邱炜菱认定“然为中人以下说法，使之家喻户晓，非小说不行”，其原因，正在于“小说言纵俚质”。^②是年，《演义白话报》在上海创刊。这份近代中国最早的白话文艺小报，以“明明白白”的白话作品自觉担负起开启民智的历史责任。

1897年的诗界，“新学诗”的尝试已近尾声，其弊端业已暴露无遗；黄遵宪公开标举“新派诗”旗帜；这对梁启超日后发动“诗界革命”，既提供了前车之鉴，又发现了垂范之师。1897年的文界，康有为的政论文和梁启超的“时务文体”，已然表现出散文文体解放的征兆，开启了一代文风，可视为“文界革命”之滥觞。1897年的小说界，维新派理论家已经充分认识到小说这一艺术门类所具有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借助政治外力的推动，历来被视为“小道”的小说观念发生着重大变革，“小说界革命”的序曲已经奏响。1897年的翻译界，严复译著《天演论》的问世震惊了知识界，进化论思想对晚清和五四文学观念产生重大影响；而《时务报》所刊载的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则预示着中国作家对新的小说类型、小说观念以及叙事方式认可与接受的开端。1897年的报界与出版界，不仅推动了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提高了小说的社会文化地位，还孕育了李伯元、吴趼人等一批报人和日后引领时代潮流的职业小说家，诞生了对晚清和五四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之贡献的商务印书馆。1897年，“言文合一”的时代呼声已在知识界产生广泛影响。可以说，1897年为20世纪初年梁启超发动的文学界革命做了多方面的铺垫，一场改变中国文学历史走向的文学革新运动，已经蓄势待发。

① 《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国闻报》1897年11月18日。

② 邱炜菱：《金圣叹批小说说》，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